



未盡的才情

從《顧頡剛日記》
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余英時◎著



未盡的才情

——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余英時◎著

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2007年3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0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余英時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編輯部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02)27634300轉5050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門市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叢書主編 方清河
校對 方策
封面設計 翁國鈞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13：978-957-08-3122-1（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目次

引言	1
一、事業心與傅斯年	4
二、顧頡剛與胡適	24
三、顧頡剛與國民黨	52
四、一九四九年以後的顧頡剛	66
五、顧頡剛與譚慕愚	106
結語	154
附錄	
一、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	157
二、顧頡剛的史學與思想補論	174
後記	185

引言

《顧頡剛日記》始於1913年，終於1980年，全書約六百萬字，是一部內容極其豐富的原始史料。從1921年到1967年止，《日記》基本上是連續的，尤足珍貴。就我所讀到的近代學人日記而言，祇有《胡適日記全集》與《吳宓日記》正續兩編份量略與之相埒。我曾撰〈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作為《胡適日記全集》的序言，藉日記的材料，解答他一生各階段的若干疑點¹。現在為《顧頡剛日記》寫序，我的重點稍有不同。反覆思考之後，我決定通過日記來窺測他的內心世界。

顧頡剛以倡導「古史辨」運動知名於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績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漢。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這次讀《日記》，我才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

1 已收入《重尋胡適歷程》（台北：聯經，2004）。

在「求知慾」之上，而且從1930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型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我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他並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後面，他還擁有激盪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更難得的是譚完全當得起他的「超群軼倫之材」的評語：1926年間一多稱她為“Chinese Jeanne d’Arc”(「中國的聖女貞德」)；1958年她已被打成「右派」，但面對毛澤東的巨大威勢「仍強硬不服罪」。顧頡剛生命中這件大事，是我在讀《日記》前完全不知道的。這兩大意外的發現，使我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不用說，1949年以後他走進了一個到處是荊棘的敵意世界，精神上一直掙扎在極度痛苦之中，始終擺脫不掉「被征服者」的屈辱感。這些內心的活動也必須通過對日記作字裡行間的細密解讀才能呈現出來。

這篇序言共分五節；第一節論他的事業心及其與傅斯年的關係，這是他的主要志業與中心關懷。第二節論他與胡適的關係，這是他的學術生命的始點。「古史辨」運動導源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展示的史學革命新典範，但是他又有超越胡適典範的學問境界，以王國維之精新兼備為最後歸宿。其中種

種錯綜複雜的互動是值得探索一番的。第三節論顧頡剛與國民黨的關係，旨在說明他爲了種種事業之故，不得不向政界尋求支援的苦心。在同一節中，他在抗戰勝利前後的政治立場和政治理念也通過日記而予以澄清。第四節凸顯他1949至1980的獨特生活境遇。這一時期中國大陸上的知識人本都是「同命鳥」，但大同之中仍有小異，每一個人的具體遭遇還是個別的。大同的部分本節概不涉及，祇有他個人「小異」的部分才值得探究。最後一節專論他和譚慕愚的一段情緣，貫穿了全部日記，上起1924，下迄1979。由於兩人交往散布在數十年之中，非聚攏在一處，便不能見其全貌。現代傳記未有不重視傳主的情感生活者。這不是發人陰私，而是因爲非在這一方面有所深入，便不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如實地呈現出來。

以上五節大致概括了顧頡剛一生活動的主要範疇。但這篇序言並非傳記，不過把《日記》中最主要的傳記材料提煉組織起來，供未來傳記作者的參考而已。

一、事業心與傅斯年

通讀《顧頡剛日記》，我第一次認識到顧先生平生志業的另一面。讓我先引一段他自己的話：

許多人都稱我為純粹學者，而不知我事業心之強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為，他人所毀所譽，必用事業心說明之，乃可以見其真相。（1942年5月31日條末）

如果不是讀到這一段話，我也和許多人一樣，把他看作一個「純粹學者」。這一段話引起了我的思考，想瞭解他為什麼不甘心僅僅以「純粹學者」為滿足？思考的結果，我認為以下三層背景是最值得指出的：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從傳統的士大夫向現代知識人過渡。儘管這一過渡並不徹底，但至少在顯意識的層面，他希望把學術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識推

廣到全社會，發揮一種啓蒙的作用。所以1929年3月13日在浙江大學餐後演講，他的題目是「怎樣喚起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很顯然的，他認為第一次新文化運動並未能深入民間²。第二，民族危機，特別是日本侵略，為他的文化事業提供了極重要的發展契機。最明顯的例子是通俗讀物編刊社(1933)和《禹貢》半月刊(1934)都是「九一八」(1931)以後創立的。通俗社是在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徵求民眾讀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後來才由顧先生接手經營。《禹貢》的〈發刊詞〉說：

這數十年中，我們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真受夠了，因此，民族意識激發得非常高。……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既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不必說別的，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地叫起來了。這不是我們的恥辱？³

2 見顧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171。

3 引自同上，頁217。

第三層背景則是個人的，即他與傅斯年在學術上的分歧和爭衡。這一問題相當複雜，留待本節下半段作較深入的分析，這裡暫且不說。

但是我必須鄭重指出，他的事業心的根基仍在學術，不過他一方面認定學術不能限於少數人的專門絕業，祇有普及到廣大的社會以後才算是盡了它的功能；另一方面，他則堅持普及化的知識必須以最嚴肅的學術研究為其源頭活水。這正是他為什麼要將「國故整理」列為他的「事業」的第一項，接著才是「民眾教育」和「邊疆開發」⁴。所以他的事業都是從學術領域中延伸出來的文化事業。他並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未嘗企圖發展政治或社會勢力。不過由於文化事業的緣故，他培養了不少學術界的後起之秀，因此在學術界，特別是史學界，他的追隨者也愈來愈多。

他的事業心在抗日戰爭期間表現得更為熾熱。從1939年在成都創辦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1941年到重慶主持邊疆語文編譯會和主編《文史雜誌》，到1943年與商人合辦大中國圖書公司，雖都是與人合作，但無一不與他自己的學術文化事業息息相關。1943年4月30日的日記說：

4 見《顧頡剛年譜》，頁333。

予入世二十餘年，雖因名招敵，事業著著失敗，而聲譽日起，朋侶日多，已立於領導之地位。思致此地位不易，有此地位而不為國家作事，未免可惜。然學界爭名太甚，予雖不與人爭，而人則必不肯放過我，政界中又爭權太亟，混飯則可，盡心竭力以從事於一業則為人所不許。邇來擺脫中央大學及組織部職務，復我自由之身，而各書肆多見拉攏。抗戰以來，得書不易，偶有新著便得傾銷，予有此人望，有此同人，正可抓住機會，在出版事業上貢獻心力，作有計劃、有系統之進行，而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使中國史學得上軌道。

在詳列種種以史學為中心的學術計劃之後，他很感慨地說：

予年已五十矣，倘能好好工作二十年，此計劃必可實現，予亦可以無愧此生矣。茲唯一希望者，即資本家能與予合作也。

在這一段話中，他的事業抱負呈露得十分清楚。為了事業，他輾轉奮鬥於學界、政界和商界之中。

他的事業心之所以在1940年代變得特別強烈，除了一般的背景外，還有另一層原因，由他的朋友賀昌群向他指點了出來：

卅二(一九四三)、八、十三，與昌群談話。渠謂予古史工作已告一段落，蓋前此為運動時期，予盡瘁於此，業已取得公眾之承認。現在運動時期已過，予可以卸此責任，此後則為他人專精之研究矣。一個人在學問上祇能做一樁事，予在學術界有此一事可謂盡職。至於此後歲月，渠以為宜致力於事業，蓋予有氣魄，能作領導也。惟予之弊在於開端時規模太大，以致根柢不能充實。此後當結集一幹部，逐漸擴張，而予僅任指導工作，一切活動由他人為之，庶乎可久可大。渠意為予所贊同，爰記於此，以供他年之省察。

他既完全認可了賀的分析，上引之語即可看作是他的自我評價。兩個月後他又加上了一段跋語：

卅二、十、十二，與(陶)希聖談，彼謂每人均有一開花之時期，此時精神充沛，發表力特強，一過此期則思想及發表力均漸即於乾涸。此話不錯，我在民國十年至廿五年一段時間，即我之開花期，今則燦華已謝，惟望能結果而已。(見1943年8月31日條末)

可見他在1943年即認定自己在古史方面已盡了開創性的功能，

以後主要是領導繼起者作精深的專題研究了。這個領導地位的信心是有根據的。這一年的3月教育部召開中國史學會，理事選舉，他「得票最多，頻作主席」，使他感到自己確已成為史學界的領袖人物(1943年3月31日條)。

顧先生在史學界之所以有此眾望所歸的成就，是和他不遺餘力地提攜後進分不開的。從1927年4月任教廣州中山大學開始，他的身邊便常常圍繞著一群青年人；1929到1937他在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執教，由於社會事業愈來愈多，依附的人更是極一時之盛。1938年8月5日他在南京回顧這八年的情況，說：

余以愛才，為青年所附集，能成事在此，而敗事亦在此。蓋大多數之青年為衣食計，就余謀出路，使余不得不與各方交接，旁人不知，以為我有意造自己勢力，於是「顧老闆」、「顧大師」之綽號紛然起矣。又有一般青年，自己有所圖謀，無如未得社會之信仰，力不足以號召，謀推戴余，為彼等之傀儡，成則彼得其利，敗則我受其禍，於是「顧頤剛左傾」，「顧頤剛為共黨包圍」之傳說宣揚於道路間矣。(見《日記》1937年7月31日條末；參閱1948年11月30日條末)

他「愛才」是絕對真實的，早已有口皆碑。更難得的是他

對追隨他的青年居然有如此清醒的認識。但是他雖然無意「造勢力」，卻因事業之故，不能不培養一批得力的助手。前引1943年4月30日所記關於「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以及賀昌群所說「結集幹部」云云，即指「附集」他的青年而言。早在1934年，他的學生牟潤孫便已在背後罵他「野心太大，想做學閥，是一政客。」他聽到這種評語後，感慨地說：

噫！看我太淺者謂我是書呆，看我過深者謂我是政客。

某蓋處於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也。（《日記》1934年4月26日條）

他引莊子語自解，其實即是承認他的「事業心」不在作「純粹學者」之下。1943年重慶中央大學的胡煥庸也說他是「學閥」，他的反應是：

甚望胡君所言不虛，使我真能成學術界之重鎮也。（《日記》1943年4月26日條）

通常「學閥」兩字含有在學術界爭「霸權」且排斥異己的意思。顧先生並沒有這種傾向。他心中的「學閥」，換一種語言來表達，是在學術界能號召「群眾」並擁有「群眾」的領袖。

關於這一問題，他晚年有一段自我檢討，解釋得比較透澈：

我自以為愛惜人才……。幾十年來，我所往來的及友好的人，都是滿腦子的反動思想，我自己本已反動，加上這班朋友，日夕熏染，就更反動了。我在這一群裡，就成一個頭子，我常常覺得手下有一群人，可以利用他們來幫助我成就事業，或讀書治學做我的接班人。所以我到處有徒黨，雖沒有組織，但可以號召。（《日記》—1969年12月31日條末。）

撇開「反動」之類的字眼不說，他希望號召友生，在史學領域中獨樹一幟的心理，在這裡已和盤托出了。他對「學閥」的稱號並不十分反感。但嚴格地說，他所追求的不是權力(power)顯赫的「學閥」，而是具有廣泛影響力(influence)的「學術界之重鎮」。

大體言之，從抗戰開始，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他的事業心漸漸超過了古史研究的專業心。1941年8月初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進修的嚴耕望便注意到：「顧先生……喜歡興辦學術事業，客人也多，一天忙到晚。」⁵ 這是最可信的旁證，清楚地點

5 見嚴耕望，《錢賓四先生與我》（台北：台灣商務，1992），頁53。

出了這一重大轉變的時刻。

顧先生獨樹一幟的強烈願望與傅斯年(孟真)最直接相關。從《日記》上看，我們可以說：傅的影響籠罩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晚年都揮之不去。他和傅從北京大學預科起，便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後來又同時成為胡適門下的兩大弟子。但不幸1927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共事之後，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僅破裂了，而且從此轉變至敵對的地位；顧先生的獨樹一幟主要便是與傅互爭雄長。1944年4月18日他在《日記》中說：「孟真真是我的政敵。」其實「政敵」一詞不妥，應該說是「學敵」，因為他們的衝突根本是在學術界，與政治不相干。

《日記》1928年4月29日條記：

與元胎(按：容肇祖)到孟真處，論研究所事，與孟真口角。

予之性情有極矛盾者，極怕辦事，而又極肯辦事。孟真不願我不辦事，又不願我太管事，故意見遂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罵。賴金甫(按：楊振聲)、元胎解勸而止。

這是顧、傅公開破裂的一天，上距顧先生來廣州整整一年了。這一年之中，兩人的分歧大概愈來愈深，至此終於爆發了出來。

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在1973年7月所寫的「記本月二十九日晚事」，文長七百字。前半段三百字敘兩人早年交情，略去不引，下面是關於破裂的解說：

一九二七年，予自北大至廈大，而彼歸國後往至廣州，入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長。以其縱橫捭闔之才，韓潮蘇海之口，有所憑藉，遽成一校領袖，雖魯迅不能勝也。予既與同事，甚願其重辦《新潮》，為青年引導，而彼曾不措意。自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長，以傳與我及楊振聲三人，籌備「歷史語言研究所」，我三人即在粵商量籌辦事宜。楊好文學，對此不加可否，而我與孟真胸中皆有一幅藍圖在。傳在歐久，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角勝，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為欲與人爭勝，非一二人獨特之鑽研所可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積疊無數資料而加以整理，然後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藉，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須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將學術淺化也，乃以作提高之基礎也。此意本極顯明，而孟真乃以家長作風凌我，復疑我欲培養一班青年以奪其所長之權。予性本倔強，不能受其壓服，於是遂與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誼臻於破滅。予因函蔡先生，乞聘我為通信研究員，